



从「西化」到现代化

五四以来有关中国的文化趋向和发展道路论争文选

WESTERNIZATION

「西化—现代化」丛书

中册

第三编 中国文化的出路：中国本位还是全盘西化？

罗荣渠 主编

黄山书社

「西化—现代化」丛书

从「西化」到现代化

中册

五四以来有关中国的文化趋向和发展道路论争文选

第二编 中国文化的出路：中国本位还是全盘西化？

罗荣渠 主编
任 菁 王美秀 执行编辑

黄山书社

WESTERNIZATION

第三编

中国文化的出路： 中国本位还是全盘西化？

1935年1月10日，上海、南京、北平十位教授联名发表“中国本位文化建设宣言”。“宣言”的政治背景是国民党政府配合所谓经济建设提出进行三民主义的文化建设。该文发表后，各地报刊纷纷转载并就此举行座谈和讨论。这篇宣言的本文空洞无物，但它提出的“中国本位”的观点影响很大。支持者和反对者在报刊上展开了热烈争论。站在“中国本位”派的对立面的是以胡适为代表的《独立评论》派。胡适把“中国本位的文化建设”称之为“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最新式的化装出现”；而陈序经则在《中国文化的出路》（1934年1月）中公开打出“全盘西化论”的旗号，也引起了巨大反响。这样，围绕中国本位文化建设的问题事实上引出了两个讨论：一是关于所谓“中国本位”的讨论；一是批驳“全盘西化”观点的讨论。本书是从当时讨论的一百五十多篇文章中挑选出的不同观点的较有代表性的文章。

关于中国左翼思想界对中国文化出路的看法，毛泽东在著名的《新民主主义论》中做了系统的阐述。本书选录了艾思奇、嵇文甫、洛甫（张闻天）的几篇文章作为代表。

通过这次关于中国文化问题的论战，“中国本位文化”论和“全盘西化论”都修改了自己的某些论点。参加讨论的多数人既反对复古的运动，也反对全盘西化，而趋向于以现代化这个新概念来重建中国文化或实现中国的文艺复兴；而现代化的基础则是工业化，这是现代中国面临的紧迫任务，这个观点在讨论过程中也逐渐为人们所认识。

文化的冲突

(1929 年)

胡 适

冲 突

在我看来，中国的问题是她在多种文化的冲突中如何调整的问题。中国现在的一切麻烦都可归咎于在将近六十年间尖锐的文化冲突中未能实现这种调整。这个问题从未得到人们的充分认识和自觉对待，而只是被惰性、自大和表面的改良措施所避开和掩盖。结果，中国今天对自己问题的解决仍像半世纪前一样遥远。

可能的解决方法

现在是我们清楚地认识文化冲突这个问题的现实而予以解决的时候了。这个问题就是，中国当怎样自我调整，才能使她处在已经成为世界文明的现代西方文明之中感到安适自在。这个问题可以有三种解决的办法。中国可以拒绝承认这个新文明并且抵制

它的侵入；可以一心一意接受这个新文明；也可以摘取某些可取的成分而摒弃她认为非本质的或要不得的东西。第一种态度是抗拒；第二种态度是全盘接受；第三种态度是有选择性的采纳。既然今天没有人坚持抗拒政策，我的讨论将只限于后两种态度。

选择性的现代化

乍看起来，选择性的现代化似乎是最合乎理性的上策。因此，这不仅是国内的提倡者，也是自命为中国之友和中国文明的热爱者的一些外国作家所鼓吹的一种最有力的态度。我甚至可以说，这是迄今任何思考过中国文化冲突问题的人所持的唯一认真和明确的态度。他们告诉我们，中国发展了灿烂的文明，这个文明绝不能在盲目接受西方文明当中丢掉。这些好心的忠告者们说，务必十分谨慎地从西方文明中选择那些不致损坏中国艺术、宗教和家庭生活中的传统价值的东西。总之，对现代文明的某些方面可以作为必要的恶来接受，但必须不惜任何代价保持中国文明的传统价值。

不受欢迎的变化

现在看来，这种态度究竟如何呢？实际上，这是说中国必须改变但又决不能改变。拆掉一座城墙，总会有人同声反对，理由是这座城市将失去中世纪的古雅。北京最初铺设电车道时，许多

美国游客看到电车穿越这座城市的中心而深感遗憾。几乎现代化的每一步都会遇到这样的指指点点。工业化已破坏了人们的家庭生活并使他们放弃了祖先崇拜。现代学校教育使中国的书法成为一种失传的艺术。课本用白话文，使学生不能用古文作文了。小学生不再背诵孔子的经书。电影正在赶走中国戏。禁止缠足是好事，可是丝袜子太贵了，现代舞蹈吓人。妇女解放也许是必要的，但是剪短发、抹口红搞得过火。如此等等。

幸福与现代化

有一次，一位来中国游历的哲学家坐滑杆翻越一座崎岖小山。他在舒适靠椅上听到抬滑杆的唱一支他觉得好听的歌曲，不觉听得入迷，并从中得到启示，悠然陷入哲学遐想：像中国人这样的人力驮兽在担负沉重苦役时仍保持唱歌之乐，这远比现代工厂的工人为自己的苦命鸣不平要强得多。他担心中国实现工业化之日，工厂不仅会毁掉一切精美的手工业和家庭工业，而且也会扼杀中国苦力一边工作一边唱歌的欢快精神。

对选择性的现代化的认可

这样一来，国内外的忠告者们都认为中国必须走选择性的现代化的道路，即尽量保持她的传统价值，而从西方文明中只采取那些适合现实迫切需要所必须的东西。

传统价值安然无恙

我曾经也是这种选择性过程的倡导者之一。不过现在我表示后悔，因为我认为谨慎选择的态度是不可能的，而且也实在不必要。一种文明具有极大的广被性，必然会影响大多数一贯保守的人。由于广大群众受惰性规律的自然作用，大多数人总要对他们珍爱的传统要素百般保护。因此，一个国家的思想家和领导人没有理由也毫无必要担心传统价值的丧失。如果他们前进一千步，群众大概会被从传统水平的原地向前带动不到十步。如果领导人在前进道路上迟疑不决，摇摆不定，群众必定止步不前，结果是毫无进步。

接受现代化

中国之所以未能在这个现代化世界中实现自我调整，主要是因为她的领袖们未能对现代文明采取唯一可行的态度，即一心一意接受的态度。近几十年来，中国之所以不再谈论抵制西方文明，只是因为中国的保守主义已在选择性的现代化的理论伪装下找到庇护所。她在采用西方文明某些方面如电报、电话、铁路和轮船、军事改组、政治变革以及新的经济制度……所取得的微小的进步，大多是外国特权享有者或担心民族灭亡和崩溃的中国人所强加的。这些方面的进步没有一项是出于自觉自愿或明智的了解而引进到

中国来的。甚至维新运动最杰出的领袖人物也没有充分了解他们所主张的东西。仅在几年以前，1898年维新运动最重要的领袖人物之一的梁启超先生曾歉然地自认道：“我们当时还不知道西学为何物，亦不知如何去学。我们只会日日大声疾呼，说旧东西已经不够用了，外国人许多好处是要学的。”^①领袖人物本身浅薄如此，当然不能引起广大群众的真正的热忱或坚强的信念。

保存国粹

果如所料，要求改革的第一个浪潮被政府中反动分子镇压下去后，知识界立即发起了一个新运动，即“保存国粹运动”。这个运动中的许多支持者又同时是后来推翻满清的革命党的成员。这个事实可注意之点是，它表明反满的革命虽然是受西方共和理想的鼓舞而发动的民族自觉运动，但它还没有摆脱文化保守主义的情绪。这个保守主义最近几年有突出表现。有人在反对教会学校和教会医院时经常使用“打倒文化侵略”的口号。

工具与进步

直到最近几年才听到有人坦率发表现代西方文明优于中国的

^① 原文见《五十年中国进化概论》，参见《梁启超选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834页，英译引文有出入。——译者

和一般东方的旧文明的议论。一位年逾花甲的思想家吴稚晖老先生于1923年—1924年发表了他的宏论《一个新信仰的宇宙观及人生观》。他在文中大胆宣称中国旧道德的总体都是低级的和粗浅的，欧洲种人在私人道德上和社会公德上以及日常生活方式上都超越其他种族之上。“他们是所有这些种族中最有才能和精力充沛的人民，他们的道德总体是高超的。”他劝告中国的知识分子把所谓的国故扔到毛厕里至少三十年。在此期间，用一切努力加快步伐建立像尘沙一般干燥的物质文明。他对被已故梁启超先生等保守思想家斥为濒于破产的现代科学文明大加颂扬而不惜余力。吴稚晖先生说：“人是一种会制造工具的动物，世界的进步全靠工具数量的增多。而科学又是工具制造的最有效途径。”“我们相信文明愈进步，工具就愈繁多，实现人类大同的理想就愈接近，那些现在阻碍人类智慧的困难问题也就愈容易得到解决。”^①

国际性的经验

这些话出自一位花甲老人之口这件事就值得注意。吴先生曾受教于江阴南菁书院，这所学院是当地最后的重镇之一。他曾在日本住过，也曾在英法两国呆过几年。他对西方新文明之了解不下于他对东方旧文明的了解的程度。

^① 以上引文在吴稚晖原书中未查到，此处据英文译出。——译者

科学与人生

吴先生的文章发表在关于科学与人生的关系问题的激烈论战之际。这场论战把中国的知识分子划分为截然不同的两个阵营。所谓“玄学鬼”阵营的领袖是张嘉森，他提倡“内省精神生活”论，相信这种内心精神生活是超越科学范围之外的。因此张先生和他的好友，其中包括已故梁启超先生，主张恢复宋明新儒学的理学。另一个是由丁文江先生领导的现代科学家阵营。丁先生驳斥陈旧的哲学而力持科学与科学方法的万能论。这场论战持续整整一年。当参加这场论战的文章最后搜集起来在 1924 年出版时，全书超过二十五万字。不消说，吴先生和我在这场论战中都是站在丁先生方面的。

科学与民主的精神成分

我在 1926 年发表了《我们对于西洋近代文明的态度》一文。此文同时刊登于日本的《改造》月刊和中国的《现代评论》周刊上。文章内容又用英文改写，作为查理·A. 俾尔德教授编的《人类的前程》一书的一章。在这篇文章中我的立场是中国必须充分接受现代文明，特别是科学、技术与民主。我试图表明容忍像缠足那样的野蛮风俗达千年之久而没有抗议的文明，很少有什么精神性。我也指出科学与民主的宗教二者均蕴育着高度的精神潜

力，并且力求满足人类的理想要求。甚至单纯的技术进步也是精神的，它可以解除人类的痛苦，大大增强人类的力量，解放人类的精神和能力，去享受文明所创造的价值和成果。我公开地谴责了东方的旧文明，认为它是“唯物的”，以其无能为力地受物质环境所支配，不能运用人类的智能去征服自然界和改善人类生活。与此相反，我认为尽可能充分利用人类的聪明才智来寻求真理，来制服天行以供人用，来改变物质环境，以及改革社会制度和政治制度以谋人类最大幸福，这样的文明，才是真正的“精神”文明。

中国文明之不人道

吴稚晖先生和我本人的这种看法仿佛过于盛气凌人和过于武断。不过这些观点都是经过多年实际观察和历史研究得出的由衷之言。当一个像吴稚晖那样的老先生宣布他认为中国人道德很低下的时候，他是在讲大实话，这使他感到痛苦远远超过他的读者所能想象的。但是那是真情不得不讲。在我以缠足几千年或千百万人当牛做马为例谴责我国的文明时，我并不是仅仅从一些孤立事例作出概括；缠足代表全体女性十个世纪以来所受人的痛苦的最残忍的形式。当我们了解到宗教、哲学和伦常道德共同合谋使中国人视而不见，丧失良知，对这种不人道缺乏应有的认识时，了解到诗人做诗和小说家写出长篇描写女人的小脚时，我们必须作出结论，在一种文明中道德观念和美学意识被歪曲到如此荒谬的地步，其中必有某种东西是根本错误的。普及教育，普选制，

妇女解放和保护劳工立法之所以未发源于实行缠足的国家，难道我们能说这纯粹是偶然的吗？

中国的旧文明

总而言之，我们对中国文明究竟有什么真正可以夸耀的呢？它的过去的光荣属于过去；我们不能指望它来解决我们的贫穷、疾病、愚昧和贪污的问题。因为这四大祸害是中国旧文明残存至今的东西。此外还有什么？我们国家在过去几百年间曾经产生过一位画家、一位雕刻家、一位伟大诗人、一位小说家、一位音乐家、一位戏剧家、一位思想家或一位政治家吗？贫困使人们丧失了生活的元气，鸦片烟与疾病扼杀了他们的创造才能，造成他们的懒散与邈邈。难道我们还要再推迟那种能提供战胜我们死敌以唯一工具并为一种新的活文明提供唯一可能基础的科学和技术文明的到来吗？

中国的新文明

日本的例子使我们对中国文明的未来抱一些希望。日本毫无保留地接受了西方文明，结果使日本的再生取得成功。由于极愿学习和锐意模仿，日本已成为世界上最强国家之一，而且使她具备一个现代政府和一种现代化文化。日本的现代文明常常被批评为纯粹是西方进口货。但这种批评只不过是搔到事物的表面，如

果我们以更多的同情态度来分析这个新文明，我们会发现它包含着许许多多必须称之为土生土长的东西。随着由技术和工业文明造成普遍的兴盛的程度日益提高，这个国家土生土长的艺术天才已在数十年间发展了一种和全国的物质进步相适应的新艺术与新文学。她的风光和风景美还是日本式的，只是比以前管理得更好，现代交通工具也更为方便。今天日本人民的爱美和爱整洁仍同过去一样，不过他们今天有更好和更美的东西可以享受了。

我们所需的文化复兴

因此，让我们希望中国也可能像日本那样实现文化复兴。让我们现在着手去做日本在五六十多年前着手做的事情吧。我们决不受那些保守派思想家们的护短的观点的影响，也不因害怕丢掉自己的民族特性而有所动摇。让我们建立起我们的技术与工业的文明作为我们民族新生活的最低限度的基础吧。让我们表达如下的希望吧！如果我们有什么真正具有中国特色的东西话，那么这些东西将会在科学与工业进步所产生的健康、富裕和闲暇的新的乐土上开花结果。

原载《中国基督教年鉴》(*China Christian Year Book*) 1929 年英文版

(张景明译 罗荣渠校)

中国文化之出路（节录）

——民廿二年十二月廿九日晚在中大礼堂讲词撮略

（1933年12月29日）

陈序经*

“把世界文化迎头赶上去 把中国民族从根救起来”

录该礼堂壁上之对联与本文题目同证

（一）

今晚兄弟很喜欢得来和各诸君研究中国的问题，尤其是中国文化的问题。中国的问题，根本就是整个文化的问题。想着把中国的政治，经济，教育等等改革，根本要从文化着手；因此今晚兄弟特别拿出“中国文化之出路”这个题目来和各位作一简短的讨论。为中国的前途计，我们要为它寻找一条出路。关于中国文

* 陈序经（1903—1967），海南文昌人。早年留学美国。归国后曾任岭南大学教授、中山大学及协和大学讲师、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教授兼研究指导师、西南联合大学法商学院院长，还曾任岭南大学校长、中山大学副校长、南天大学副校长等。

化的主张，大约可分作下列三派：

（一）复古派——主张保存中国固有文化的。

（二）折衷派——提倡调和办法中西合璧的。

（三）西洋派——主张全盘接受西洋文化的。

兄弟是特别主张第三派的，就是要中国文化彻底的西化。现在兄弟先来给第一第二两派下一个批评，然后再提出主张第三派的理由。

.....

（三）

（3）

现在世界的趋势，既不容许我们复返古代的文化，也不容许我们应用折衷调和的办法；那么，今后中国文化的出路，唯有努力去跑彻底西化的途径。上面我们已解释了第一条路（复古派）和第二条路（折衷派）都不能跑得通；惟有第三条路（西洋派）才是我们当行或必须行的途径。第一条路和第二条路的缺点是：前者（复古派）昧于文化发展变换的道理；而后者（折衷派）昧于文化一致及和谐的真义。前者误以为环境时代是不变的；所以圣人立法，可以用诸万世，而施诸四海；而后者则误以为文化的全部，好像一间旧屋子，我们可以拆毁它，看看哪块石，或是料木，随便可以留用。但是他们简直忘却了文化各方面的特质，是不过我们的假定；在文化本身上，并没有这么的一回事。其实文化是完全的整个，没能分解的。总之，无论积极方面，或消极方

面，都可以证明中国文化的出路，是要去彻底的西化。照主张彻底或是全盘西化的人们的见解，以为目下我们的政治，经济，教育，社会，事实上，都已采用西洋的方法，这就是不只在思想上，并且在实行上，都已趋于完全采纳西洋的文化。他们的主张，有下面的两个理由：

（一）西洋文化，的确比我们进步得多。

（二）西洋现代文化，无论我们喜欢不喜欢去接受，它毕竟是现在世界的趋势。

伸言之：（一）从文化发展上看来，西洋近代的文化的的确比我们的进步得多，它的思想，也的确比中国的思想来得高。西洋文化无论在思想上，艺术上，科学上，政治上，教育上，宗教上，哲学上，文学上，都比中国的好。就是在衣、食、住、行的生活上头，我们也不及西洋人的讲究。即使梁任公先生在他的“清代学术史”辨，也要承认非用西洋的方法，便不能把国学来研究。真的，死的国学，也须要赖西洋方法的注射，才得保其生存！

（二）从理论方面说来，西洋文化，是现代的一种趋势。在西洋文化里面，也可以找到中国的好处；反之，在中国的文化里未必能找出西洋的好处。精神方面，孔子所说的仁义道德，未必高过柏拉图的正义公道。十三世纪，中国的火药印刷指南针数种，却为西洋人所接纳而加改良；物质方面的好处，也可以在西洋文化里找到。至若民治和科学，中国都没有。即如座上诸君今晚得来这里听讲，大多数人所穿的服装，和目下诸君所受的教育，现行的社会制度，和国家布施的宪政，无一而非西洋的东西。又如孙先生的三民主义，民族，民权，民生，根本上都是西洋文化的产物。一切政治，社会，教育，经济，物质方面，精神方面，理